

名文览艺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张继编



基础写作教学参考书

名 文 览 艺

张 继 编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名 文 览 艺

张继编

*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二工厂印装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5 千字 190

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0

定价 1.55 元

ISBN7-304-00364-2/121·1

前 言

读书是人生的一大快事，可以长知识，增本领，受陶冶，要提高写作能力，非阅读在先不可。鉴赏能力与阅读能力是相辅相成的，只有“眼”高了，“手”才能高。此中的道理，我们在阅读和写作的实践中自会有所体味。

作为基础写作的参考书，我以为应该为初学写作的人提供一个有益的读本。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想编一本“文镜”或“名文荟萃”的书。我把这个想法拿给朋友们讨论，他们说前一个太雅，后一个又偏俗，都不可取。后来就产生了现在这个名称——名文览艺。名文，可理解为名人名作，或许也应包括那些名不见经传，却颇具特色，又十分耐读的佳作。本书的选目是两者都兼顾了一些的。至于说到“览艺”，心中就多有惶恐了，虽然附了几篇赏析和文体写作知识的文章，但不一定“览”到了名文和某种文体中那真正的“艺”。这还要靠读者的慧眼了。

基础写作重在基础，这个“基础”应当是适用于一切文章写作的。这一观念的明确是在李景隆先生的指教下形成的。

观念的明确，致使视野相应地开阔些了。文体的面尽量宽一些，每一种文体的文章类型也尽量多一些。其中，论文、散文、杂文、科学小品文、调查报告，都搞了一点。尽管如此，也还是有不足之感，有遗珠之憾。特别是有的篇目稍嫌旧了一些。

关于书中所“附”的文体写作知识性文章，大多是一孔之见，文笔也多稚拙粗鄙，还望读者多多教正。至于赏析的文章，更是个人的阅读体味，仅供参考。

本书成书过程中,韩少华先生曾多次指导;上海电大张磊同志、福建电大何绵山同志,都给予了很大支持;我的朋友石毅、李烈也给予了无私的帮助;责任编辑任岩同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,并负出了大量的心血,在此一并表示谢意。

一九八九年一月
于北京莲花池畔
张继编

目 录

悼伯承	邓小平(1)
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艺工作 和大学生谈学习方法 新时代·新观念·新挑战 附:漫谈说理	钱学森(6) 钱伟长(13) 王纪宽(28) 张继缅(36)
怀念胡风 幽燕诗魂 附:传神之作	巴 金(60) 丁 宁(73) 张继缅(82)
岚山情思 岚山花雪 附:细腻 宏伟 深邃	柯 岩(97) 袁 鹰(102) 张继缅(108)
记忆 记忆 附:哲理的诗	凤 子(116) 韩少华(120) 张继缅(123)
西湖即景 西湖漫笔 附:异曲同工	于 敏(132) 宗 璞(139) 张继缅(143)

日记一则	夏 衍(151)
附:散文三谈	张继缅(154)
答卫君	巴 金(172)
傅雷家书(节选)	傅 雷(175)
归	〔台〕三 毛(178)
附:散文的感情力量	张 磊(186)
散文的困惑与超越	何绵山(203)
怕说“红楼”	邵燕祥(216)
允许“势可两立”	公今度(219)
附:谈谈杂文	张继缅(221)
时文三弊	刘 征(228)
科学小品文四篇	袁 泊等(230)
附:浅谈科学小品文	张继缅(236)
信息时代的呼唤(节选)	陈弘毅 尚翠云(240)
附:关于调查研究	张继缅(248)

悼 伯 承

邓小平

伯承久病，终于不治。我和他长期共事，相知甚深。他的辞世，使我至为悲痛。

伯承早年从军，戎马一生。在辛亥革命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，他就是“手执青锋卫共和”的一员猛将。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1915年所摄的照片，那时，他二十二岁，风华正茂，雄姿英发。就在第二年讨袁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，他率部冲锋陷阵，头部连中两弹，失去右眼。他在大半个世纪中，指挥了无数次战役战斗，九处负伤，屡建战功，以足智多谋的“独目将军”闻名于世。

我认识伯承，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。初次见面，他就给我留下忠厚、诚挚、和蔼的深刻印象。我们一起工作，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，一个师长，一个政治委员，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、中原野战军、第二野战军，前后共事十三年，两人感情非常融洽，工作非常协调。我比他小十多岁，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，但合作得很好。人们习惯地把“刘邓”连在一起，在我们两人心里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。同伯承一起共事，一起打仗，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。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，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。

伯承同志党性坚强，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，事事顾全大局，服从大局。为了党的整体利益，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，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

的任务，兢兢业业，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。长征开始前，他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，被错误地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，到五军团去当参谋长。他忍辱负重，积极工作。长征一开始，伯承率五军团担负了最艰巨的殿后任务，同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恶战，保护了中央机关的安全。后来他又担任先遣司令，率领部队斩关夺隘，为长征开辟前进道路。红军第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，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，同张国焘另立中央，分裂党、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，他始终保持着这种高贵品质。解放战争的第二年，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。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。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，伯承对他们说，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，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。釜底抽薪，焉能惧怕烫手，即使作出牺牲，也义无反顾。伯承这种态度，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。

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，大军事家。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，在国内外屈指可数。他熟谙兵法，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，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。他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，从实际出发。他判断敌情准确，计划战斗周密，巧于出奇制胜，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妙算。作战指挥上的神机妙算，用伯承的话说，就是首先要靠弄清楚任务、敌情、我情、时间、地形。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，常说：“五行不定，输得干干净净。”伯承最反对军事指挥上墨守成规，粗枝大叶，大而化之。他常用“烧香找错庙门”，“蚊子叮泥菩萨，看错了对象”等四川俗话，幽默诙谐地批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，指挥莽撞，办事马虎的同志。伯承善于总结经

验,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,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。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。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,伯承是有大贡献的。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恰如其分的。

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,伯承的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面,也表现在他对我军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。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,他就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,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。1946年下半年,正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事频繁的时候,平均二十天就要打一仗。在那种情况下,他还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补译、校订《合同战术》一书。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《前线》,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,而要象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。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,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,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。大陆解放不久,他从军事建设的全局出发,给中央写信,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,自告奋勇去办陆军大学(后命名为军事学院)。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,伯承呕心沥血,在仅剩的一只左眼视力也已严重减退的情况下,还拿着放大镜,将上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。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,对我军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。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,那是不公正的。完全可以说,伯承是我军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。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,永远值得我们珍视。

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,不但对政治委员,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。他下部队,总要请政治机关派人一起去。不是为了替他写讲话稿,或者为他本人的活动写新闻报

道,而是把他们看作政治机关的代表,遇事随时随地同他们商量;在作军事部署的时候,便于他们及时布置政治工作。当他要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动员时,往往把自己起草的讲话提纲送政治机关阅改。他这样做,不止是出于谦虚,更是出于把政治工作看成我军的生命线。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,关心政治工作建设。可以说,他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。

伯承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“拯民于水火”,正是这种博大的胸襟,使伯承从旧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。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一样,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看清楚了,要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,除了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,别无它途。伯承在1924年接触了共产党人,但他没有马上参加共产党的组织,而是在经过了两年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之后,才确定了自己的政治选择。一旦看准了,选定了,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,万死不辞。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、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,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,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,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,顺境也好,逆境也好,无论何时何地,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,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、服从于党的需要,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,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,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。

1942年冬天,太行山区军民和延安的同志祝贺伯承五十寿辰的时候,他曾说过:离开党,象我们这些人,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。他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:如果我去世的时候,能在我墓上立一块碑,上书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,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。

回顾伯承为共产主义事业所走过的战斗历程,他的卓越

贡献，他的坚强党性，中国布尔什维克——这个意味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，他是受之无愧的。

（《人民日报》1986年10月21日）

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文艺工作

钱学森

文艺是文化的一部分。现在整个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清楚了,也可以说,文艺工作今后的任务也清楚了。依我看,这就好象四十四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,明确了当时文艺工作的任务一样,现在,在新的历史时期中,文艺工作的方针任务也明确了,就是说,应该统一到《决议》上来。方针明确了,日下的问题是文艺工作怎么干?我想谈一点这方面的意见,请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有两个基本问题,一是面向人民群众,面向全体人民的问题;二是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问题。这两个问题我以前已讲过,这里就不重述了。我着重从宏观角度讲讲国家应如何管理文艺工作的问题。

首先,文艺工作包括些什么?为此,先要弄清文艺本身有多少门类。我认为,划分文艺的门类要有现代的观点,要扩展文艺的范围。今年,我曾讲过属于文艺的有十个方面。现在,再加一个。这十一个方面是:小说杂文,诗词歌赋,建筑,园林(包括盆景、窗景、庭院、小园林、风景区、国家公园等),美术(包括绘画、造型艺术、工艺美术),音乐,技术美术(这是一门新的学科即工业设计与艺术相结合),烹饪,服饰,书法(这是我新加的),综合艺术(戏剧、电影等)。这样划分十一个部分妥当不妥当,可以考虑,可以有另外的划分,但我认为它们都应

属于文艺范围。我觉得，在将要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，看文学艺术应有广阔的眼光，不要用固定的、古老的眼光来看问题，认为是文人韵士搞的才算文艺，其它是生活琐事，不登大雅之堂的！我认为看问题思想要放开些，要实事求是。烹饪、服饰、技术美术都应算艺术。将来或许还会出现新的文艺形式。因此，文艺学也应不断有新的形式。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，生产力在不断发展，文学艺术也会在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带动下出现新的形式（如现在就有上方和四周同时放映的“环视电影”）。这叫做科学技术现代化带动文学艺术的现代化。这就是文艺和科学技术的关系。实际上，有些艺术门类是文艺和科技交叉的产物。比如上面讲的建筑、园林、技术美术等就是这样。它们是文学艺术，但又有属于技术的部分。有关建筑艺术、园林艺术的团体也应设在中国文联，但现在却都在中国科协。请文艺工作者把从事以上这些方面工作的同志看作自己人；第五次文代会是否可请这些同志参加？希望文艺界把门开大些，这是有利于我国文艺工作的发展的。

文艺的范围明确了，那么我们国家对文学艺术到底该如何管理？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直到几年前大约四十年时间，我们管理文艺是靠“汇报演出”式的办法，文艺作品的评价是领导说了算。科学技术就不是，也不能这样，科技要靠实际结果定案，比如卫星上了天，完成了预定的任务，才算给该项科技定了案。领导说了算的做法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，皇帝老子说了算的办法。其实，如果这样，当领导的恐怕也很难，他说一句话就要定案，那这话如何说就得好好思考了。这种作法是不行的。从理论上讲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，因为马克思主义讲实事求是。另外，从实际上看，效果也不好。从前领导说了算，他如果说某某作品不好，接着而来的是又打棍子又扣帽子，搞得文艺

工作者特别难当。

今年七月三十一日，万里同志在国家科委召开的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》上讲话，着重讲了国家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问题，民主与科学，这不就是从前讲的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嘛！那是差不多六十八年前五四运动的口号呀！万里同志讲话给我启发极大。日本的藤山纯一先生说：“鲁迅生前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尚未解决，阅读和研究鲁迅作品，因此比以往更为重要了。”是什么问题尚未解决？是以前我们提倡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反对封建主义！

《决议》也讲得很清楚，它指出，要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。因此，文艺管理工作也要反对封建主义。要坚决抛弃那种领导说了算的管理文艺的办法。那种管理办法是落后的、不科学的办法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物质文明的建设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相似之处。如物质文明建设中的经济体制我们要改革，改革什么呢？我们从前都是指令性的计划，不切合实际的指令也要执行。微观管得很死，结果不符合客观实际。现在经济工作明确了，微观要放活。文艺工作也是一样，微观应放活。文艺作品的好坏自有公论，领导不要定案（国家领导不要对哪一个文艺作品下结论），要请大家议论，要有很好的民主风气。

但是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微观放活这一方面。国家放手不管也不行，那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。国家要在宏观方面，在总的方面，如同经济工作一样，对文艺工作加以引导和调节。经济工作是“微观放活，宏观控制、调节”。我认为文艺工作应是“微观放活，宏观引导、调节”。对具体作品等不要下结论，作死规定，但总的方面要引导、调节。

关键是如何引导、调节。对此，我想可以有以下几个方

面：

第一、必须有科学的文艺学。要大力开展作为考察文学艺术这一社会活动规律的文艺学的研究，以及综合学科即文化学的研究。社会主义文艺学是要寻找文学艺术的社会活动的规律，研究文艺的规律。研究科学技术规律的学问我叫它科学学，包括科学技术体系学、科学的能力学（科学技术的工作力量如何形成的）以及科学政治学（即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的联系）。文艺也应有相应的三个方面，即文艺的体系学、文艺能力学、文艺政治学（文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，特别要研究文艺的社会效益）。

现在，文艺事业一到国家的计划部门就头痛，觉得文艺花钱不见影子，他们没看到文艺花的钱是一本万利。文学艺术对建设社会主义起什么作用，要作定量研究，光一般说说不行。科技工作的成效可以调查，看看一块钱花到科技工作上有多少利，如有的调查结果是，一块钱有十元利。文艺搞好了，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水平，到底有多少利？我认为，文艺如果搞好了，效果好得很，不是一本十数利、数十利，而是千利、万利！这就是政治文艺学，也有同志称之为“精神经济学”。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行为科学。文艺学也应该加以研究。总之，要从国家的宏观管理方面加强文艺学的研究。

第二、文学艺术的理论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想，我们的革命导师当时革命工作的事情多得很，没功夫研究这些问题——文学艺术的理论，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美学（马克思主义美学即文学艺术活动上升到哲学的过渡桥梁，或说是文艺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）。现在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艺，为了文艺的宏观管理，我们应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研究。

目前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好象在讨论问题时常常把原则、观念同方法混在一起,本来是原则、观念问题却说是方法问题。这也许另有苦衷。但我认为文艺理论工作者要分清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:理论的精髓是原则、观念,而怎么表达这个原则、观念,比如用汉语还是用英语?用普通话说,还是用上海话说?那才是方法。所以,分析文艺工作如果用历史唯心主义,不用历史唯物主义,那就不是什么方法问题,而是原则、观念问题了。

第三、文艺工作者要了解并掌握文艺的科学理论,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。也就是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、美学、文艺理论、文艺学,要有丰富的社会知识,包括关于我们今天世界的知识,诸如历史、地理、经济、科技知识等。认为文艺人可以不要任何规律而自由创作,只要写作技巧就可当作家,这种看法不对。最近,有的作家认为,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。为什么会这样看呢?我想,问题恐怕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、对于历史唯物主义、对于世界历史等的知识不足。这说明,文艺工作者要具有做文艺工作的理论知识。

科技人员要做联系实际、改造客观世界的工作,并要有创造性。但他的创造性不能随心所欲,不能违反对象的基本规律即自然的客观规律,而是必须服从客观规律。工程技术工作在十九世纪以前是不讲理论的,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,但他没有理论;到十九世纪中叶就不行了,那时成立了高等工科院校,要当工程师首先要学基础课,学物质客观世界的规律,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。在这方面,文艺已经落后了,要赶快赶上去。文艺的创作一定要在科学的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来进行。如果这个做到了,就不会盲目引进资本主义文艺的某些东西。所以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有大学以上水平,要有相当长的时间(至少